



聪明误

张欣

我认识一位老师,她说遇到过很多聪明的学生,反应特别快像精灵一样。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碰到困难时一定会绕道走,否则不是白聪明了吗。绝对不跟困难死磕。

然而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,一知半解的皮毛外功是容易取得的,感觉自己芝麻开花节节高每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,尤其是聪明的孩子,完全可以傲视群雄。不过呢,这个世界如果只靠聪明就可以混好,那就太简单了。

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无论哪一行,要想长一寸的内功都得使出洪荒之力,是否成功还未可知。这是因为有许多事物除去表面的难易之外,深究起来都有一个巨大的精进空间。

就好像某位大师,他做得已经非常好了,我们还是觉得可圈可点。那是因为我们只负责评论,真是连下场遛遛的资格都没有,而他精进到了七十岁。

上海的一位老爷爷做葱油饼,他要从千万家葱油饼商家中脱颖而出,代价就是他认真踏实地做了一辈子葱油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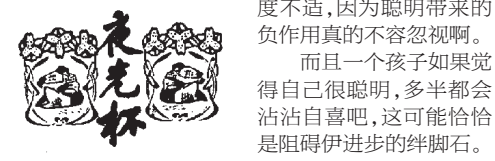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你会说,我会就行了,不需要那么好。那你就要接受自己的平凡而不是强调自己的聪明。所谓聪明就是离杰出比较近的那些人,说他们直接生在罗马也不为过,他们是最有条件登顶的人,就是因为没有耐心磨炼自己,于是离目标越来越远,不是很可惜吗?

而我们看到很多做出优异成绩的人,他们看上去好像也不算精明能干,有些还是木讷的样子,可是他们就是能把一件事做得让我们叹为观止,从心里觉得他们好了不起。我想除了内秀和才华之外,核心竞争力就是他们选择了跟困难死磕,不厌其烦,反反复复,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,去体会纤毫之间的差异或变化,然后把精确度调试到最佳状态。

所以我们对于事业有成人士的赞扬,一般都是沉稳、包容、守拙、大智若愚等等,非常奇怪的是聪明这个词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,渐渐变成了一个中性词,如果你形容一个人太聪明了,大家马上会反向思维。

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被家长拼命培养,非要叫伊在人前表演才艺,博得掌声,都会有点轻度不适,因为聪明带来的负作用真的不容忽视啊。

而且一个孩子如果觉得自己很聪明,多半都会沾沾自喜吧,这可能恰恰是阻碍伊进步的绊脚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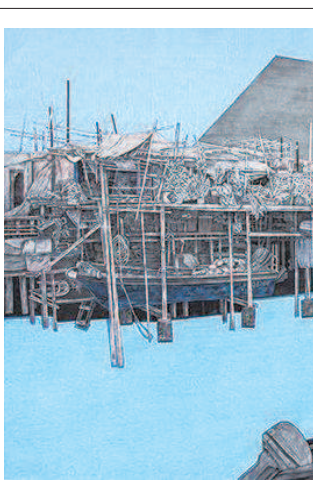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的记忆里,众多戏曲表演艺术家,演戏始终是宁肯自己吃苦,绝不使戏受害。他们演出前,一进后台,不多言笑,进入默戏状态。穿好服装,不再坐下,以免戏服有褶皱。他们保持“带戏上场”“带戏下场”,这种对戏负责、对观众负责的精神,有口皆碑,传为美谈。

戏曲表演艺术家这种演艺美德,或者叫演艺思想,总体是三个重点:创新意、演人物、求完美。

早年,马连良先生在“扶风社”组班,演出时坚持“三白”,即护领白、水袖白、靴底白。“三白”

诗人臧克家在《有的人》中说:“有的人死了,但他还活着。”汤因比就是这样,他谢世已经47年了,但他还活着,活在他的著作中,活在这位“智者”的“警世良言”中,活在世间每个个体的心田中;诗人又说:“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,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,很高。”不是吗?汤因比从英国史学大家到20世纪西方史学大师,乃至被誉为“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”,没有之一。

环顾寰宇,近望申城,在这样的日子里,我想起了他——阿诺德·约瑟夫·汤因比。他生当盛世,其时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的雍容华贵和轻歌曼舞,风光一时。汤因比自传(即《人类的明天会怎样?——汤因比回思录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新版)记录着,他有一个蒲公英吹拂过的童年:伦敦、肯辛顿公园、皇后大道、巴士、马车、动物园等,四处都留下了他童年和少年时的身影,但这如同昙花一现,儿时的天堂被晴天霹雳劈得粉碎,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,两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,战后



戏不美,不迁就

鲍世远

感,为新戏中的主要人物的服装设计,提供了清新的改革思路。果然,后来在《赵氏孤儿》中,主要人物程要在“打程婴”“观画”时穿的服装,根据情节事件、人物情绪思想,身受苦难的需要,精心设计,获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联想起周昆芳先生,当年演出《义责王魁》,当老仆人明白了王魁的恶毒心肠后,他义愤冲天,义责王魁丧尽天良,人面兽心,蛇蝎心肠。当王魁一声怒骂:“老奴才,滚

每个“大白”都有自己的名字

方培

大。防护服里闷热不堪,汗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,但根本没有时间去擦,也不敢去擦,因为你得默认自己身处一个污染环境。而光线反差对扫码有着很大影响……

几个小时下来,我们的经验值水涨船高:比如,在遮阳棚的阴暗处扫码成功率更高;又比如,要按住PDA扫描键,从上往下、从左往右地毯式扫描,如果再扫不出,就需要调整对方手机角度;自己手机实在扫不出的,可以请她用微信把截图发给同伴,用同伴的手机扫码;

世界的风云变幻,在这个天翻地覆的20世纪,他足足生活了75年,也砥砺前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:他是史家,著作等身,从皇皇巨著《历史研究》(十二卷本)到年迈时写就的史诗性的《人类与大地母亲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);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,他不只是一位坐而论道的学者,还是一位投身社会实践的战士。在“一战”和“二战”时,他任英国外交部智囊,参与了两次巴黎和会,直到晚年他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奔忙。他反对战争,捍卫和平,抨击种族歧视,时刻关心人类世界的前途,这真是“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”。

翻检汤因比的编年史,有意思的是,1929年7月23日至1930年1月29日,有一次中国之行,其间1929年12月23—25日,他曾到过上海。他的记叙详细,且始终与伦敦初兴时的景象相比,以其史家敏锐的眼光与睿智,感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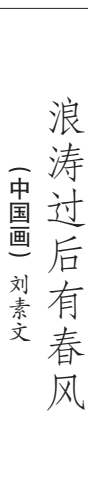
出门去!”老仆人脱下“老奴才”的外衣,狠狠地扔给王魁。这时老仆人露出一件青色内衣,一身正气,熠熠发光,在他雪白的须发相映下,如同大雪压青松的美景。我就联想起陈毅同志的诗: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,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”。这正是义责王魁的生动写照。

以力求完美,力求舞台形象美化,把一切封建丑陋、迷信色情、恶俗凶残的丑恶形象扫出舞台,永无立足之地。

期盼戏曲表演艺术家们,时刻不忘:“戏不美,不迁就!”

浪涛过后有春风

(中国画) 刘素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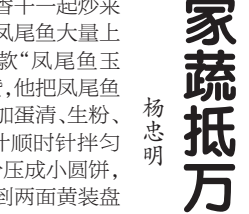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的风景人文,并预言:“上海定当在黄浦江边的泥岸上崛起,这似乎不可避免”。又认为:“上海可能成为现代世界最伟大的都市之一。”后来的上海发展史证实了汤因比的预言。

由上海说及中国,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之行时,他漫游神州大地,从旧世界到新世界,以其之行与思,发现了一个别样的“新东方”,断言中国是“一个伟大的国家!”他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。《历史研究》的前三卷,就有六处论述了中国文明。直至晚年,他始终能看出中国所显示的“良好的征兆”(《人类与大地母亲》中语)。他在与日本佛学家兼政治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,一再称颂中华民族的美德能代代相沿,并对中国文明的独特地位及其在未来世界中的引领作用充满期待,在汤氏的心目中,这个早就被他视为“伟

责编:吴南瑶

大的国家”,其前景灿然,历史再一次证明了这位史家的不凡与远见卓识。

汤因比不只是全力研究世界文明及其未来,还特别关注人类个体的命运,晚年犹然,他为天下众生呐喊,他为生命至上呼唤,被世人誉为“具有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”的历史学家。不管世道坎坷,阴晴圆缺,乃至处于绝境时,他总充满信心,正如他的孙女波莉·汤因比所言:“我的祖父为我们树立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希望而非绝望的榜样。”知汤公者,孙女也。倘问汤因比给我们留下了什么?的确,他的思想文化遗产留给后世的很多,然简言之,在笔者看来可以归纳为两个字:“希望”。希望,是我们的追求,人类的理想,它为前行者带来了无穷的力量。悠悠千载,前路漫漫,行囊中始终只装着一份希望。当下,不管奥密克戎毒株如何凶险,只要我们风雨同舟,齐心协力,雾霾终会散去,一定会迎来春天和煦的阳光,带着希望一起走向未来!



「家蔬抵万金」

杨忠明